

# 泰州光孝寺始祖「覺禪」考(上)

葛宗烈\*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泰州地處江蘇中部，長江下游北岸。戰國時期，其地屬楚，名曰「海陽」。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前二三三），秦國滅楚，設晦陵縣，「晦海而高」<sup>1</sup>，故名。東晉義熙七年（四一一）分廣陵郡置海陵郡，其時海陵縣、仍為廣陵郡轄縣。唐高祖武德三年（六二〇）海陵縣改稱吳陵縣，武德四年依吳陵縣設置吳州，武德七年廢吳州復稱海陵縣。南唐烈祖昇元元年（九三七），依海陵縣設置泰州，取「通泰」義，泰州之名始此至今。北宋崇寧二年（一一〇三）九月癸巳，徽宗詔令天下州軍建崇寧寺，北宋域內各州軍均奉旨建崇寧寺，泰州地方也不例外，奉皇帝詔將本地歷史最為悠久的古寺更名為「泰州崇寧寺」，後又四次奉敕更名，直至紹興七年（一一三九）方奉敕改名「泰州報恩光孝禪寺」。

清代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文海福聚法嗣性慧自寶華山慧居寺（今隆昌寺）渡江東下出任泰州光孝

寺住持，自此改禪為律，遂為千華律宗重要分支，寺名「泰州光孝律寺」（以下簡稱「光孝寺」）。民國早期，近代高僧常惺曾任光孝寺住持，創辦「光孝佛學研究社」。常惺以後，其弟子現代高僧南亭又繼其師衣鉢出任光孝寺住持、光孝佛學研究社社長。再傳弟子現代高僧成一、妙然、了中均曾就讀光孝佛學研究社，今皆被尊為光孝寺住持，而使這座江淮名剎名聞遐邇。

令人遺憾的是今光孝寺崇寧二年以前的悠悠往事，由於年代久遠，已經湮沒在歷史塵埃，《崇禎泰州志》卷七〈方外志·寺觀〉載：

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州治西。晉義熙年間覺禪師初建。

上述所記即為現存相關光孝寺開山始祖見諸古籍全部資料。

據《晉書地理志》，東晉時期，海陵為廣陵郡下屬八縣之一。今查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梁釋慧皎《

高僧傳》，「義熙年間」活動於東晉轄地的中外僧人，史上留「名」者可謂寥若晨星，屈指可數。而《崇禎泰州志》這部地方誌中竟然留下東晉僧人「覺禪」大名，實在令人感到神奇。遺憾的是：覺禪這位光孝寺的開山始祖來自何方？曾經做過哪些功德？《崇禎泰州志》中現存區區十字記載，相對「覺禪」這位先賢而言，顯得過於語焉不詳。筆者不揣疏陋，茲考如下，就正方家。

# 一、

根據現有資料可知「覺禪」是東晉「義熙年間」人，「義熙」是東晉安帝司馬德宗的第四個年號，從四〇五年至四一八年，共計使用十四年。東晉「義熙」年間長江下游北岸廣陵郡地區的佛寺，除泰州古光孝寺（寺名已不可考）外，還有原廣陵謝司空寺（今揚州天寧寺）。

（清）黃之雋《江南通志》卷四十六：

天寧寺，在新城拱辰門外，東晉時為謝太傅安別墅，義熙十四年，有梵僧佛馱跋陀羅尊者譯《華嚴經》於此，時右衛將軍褚叔度特往建業，請于謝司空談，求太傅別墅建寺焉，名謝司空寺。

又（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四亦載：

天甯寺居揚州八大刹之首，寺之始末基址，郡志未經核實，故古跡多所重出。……又傳晉時為謝安別墅，義熙間，梵僧佛馱跋陀羅<sup>2</sup>尊者譯《華嚴經》於此。右衛將軍褚叔度特往建業請于謝司空談<sup>3</sup>，求太傅別墅建寺。又《華嚴經序》云：「尊者于謝司空寺別造履淨華嚴堂譯經。」又曰：「寺西杏園內枝上村文思房有銀杏二株，大數圍，高百三十餘丈，謝太傅別墅在此。」

《江南通志》、《揚州畫舫錄》均以佛馱跋陀羅曾在今日揚州天寧寺的前身，當日廣陵「謝司空寺」譯《華嚴經》，來證明揚州天寧寺建於東晉「義熙十四年」或「義熙間」。據南朝（梁）釋僧祐所撰《出三藏記集》：

《華嚴經》胡本凡十萬偈，昔道人支法領從于闐得此三萬六千偈，以晉義熙十四年，歲次鶉火，三月十日，於揚州司空謝石所立道場寺，請天竺禪師佛度跋陀羅手執梵文，譯胡為晉。

需要指出的是：《出三藏記集》所說「揚州」並非指今日揚州。東晉時全國分為十九州，當時之「州」類

似今日之「省」，「揚州」是十九州之一，下轄十八郡國，《出三藏記集》中的「揚州」即是全國十九州之一的「揚州」。

今日揚州在晉代名曰「廣陵」，西晉時屬徐州下轄七郡國之一，廣陵郡下轄淮陰、射陽、興、海陵、廣陵、鹽漬、淮浦、江都八縣，郡治先後設在淮陰、射陽，直至愍帝建興元年（三一三）廣陵郡才還治廣陵。東晉沿襲西晉，廣陵郡治設在廣陵縣。今日的揚州有「揚州」之名始自唐代武德九年（六二六）。東晉之「揚州」與今日之「揚州」不是同一概念。

當日揚州州治設在丹陽郡的建業；西元三一三年，西晉末代皇帝愍帝司馬鄴即位，「建業」避帝諱改爲「建康」：西元三一七年司馬睿在建康即晉王位，建立東晉；次年稱帝，建康自此成爲南朝東晉、宋、齊、梁、陳五朝首都。因爲揚州州治所在的建康同時又是東晉首都，因此又被稱做「揚都」，東晉文人庾闡曾作《揚都賦》，所謂「揚都」就是「建康」。《北齊書·顏之推列傳》：「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爲亡國之人。」中華書局校勘記云：「按：當時習稱建康爲揚都。」南朝（梁）慧皎《高僧傳》卷二〈譯經中〉「晉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先是沙門支法領於闐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至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賢（佛馱跋陀羅）爲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業、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

《出三藏記集》所說「司空謝石」是東晉名臣謝安之弟，今考《晉書謝石列傳》，謝石死後朝廷「追贈司空」，故後人稱「謝石」爲「謝司空」。由上可以確定佛馱跋陀羅譯《華嚴經》是在東晉首都和東晉揚州州治所在地的建康（今南京市）、謝安之弟司空謝石所建道場寺中翻譯出的。

而《江南通志》、《揚州畫舫錄》中所說「揚州」是指東晉廣陵郡郡治所在廣陵今揚州市，《江南通志》、《揚州畫舫錄》中所說「謝司空琰」是指謝安之子「謝琰」，今考《晉書謝琰列傳》，謝琰死後，朝廷「贈琰侍中、司空」，故後人亦稱「謝琰」爲「謝司空」，古建康謝石所建「謝司空寺」，與古廣陵謝琰所建「謝司空寺」有別。據《出三藏記集》的《高僧傳》記載，亦可確定佛馱跋陀羅《華嚴經》不是在東晉時期「廣陵」今揚州市、謝安之子司空謝琰所建謝司空寺今揚州天甯寺中翻譯出的。

《出三藏記集》、《高僧傳》、《江南通志》、《揚州畫舫錄》四書所說「梵僧佛駄跋陀羅」，就是中國佛教史上著名天竺高僧，佛經大翻譯家佛駄跋陀羅。根據上述資料所述佛駄跋陀羅事蹟結合《崇禎泰州志》記載，可以推斷《崇禎泰州志》所說「覺禪」與《出三藏記集》、《高僧傳》、《江南通志》、《揚州畫舫錄》四書所說「佛駄跋陀羅」是同一個人，理由如下：

其一，佛陀跋陀羅在包括海陵縣在內的廣陵郡地區，其活動時間與覺禪在海陵的建寺時間相合。據《出三藏記集》卷十四載：

佛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以義熙八年，遂適荊州。……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在荊州。佛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小留。」佛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慚。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答曰：「德量高邈，非凡人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

由上可知佛陀跋陀羅是在義熙八年（四一二）因緣結識時任東晉太尉後爲劉宋開國皇帝的劉裕，並在此年隨劉裕回東晉首都建康（今南京市），始卓錫道場寺。《江南通志》稱「義熙十四年」佛駄跋陀羅在廣陵活動，東晉義熙八年至十四年這一時段，即《揚州畫舫錄》所說「義熙間」，與覺禪在海陵建寺的時段「晉義熙年間」相合。

其二，從佛駄跋陀羅的個人志向及其獨特個性來看，結合海陵所處地理位置其在義熙年間遊方海陵之時建寺合乎情理。義熙八年至十四年，正是佛陀跋陀羅在建康（今南京市）道場寺弘傳禪法之時，其時大師所在的建康道場寺不僅當日東晉佛教中心，也是東晉最重要的傳禪中心。據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載：佛駄跋陀羅年青之時就有「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sup>4</sup>之志，自比「身若流萍」<sup>5</sup>，是位「志在遊化，居無求安」<sup>6</sup>的梵僧。以佛駄跋陀羅的獨特個性，在其駐錫建康之時，興之所至而至一江之隔的廣陵地區弘法傳道、乃至建寺，應不意外。因此，可以確認佛駄跋陀羅沒有在東晉廣陵郡郡治廣陵縣的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卻不可斷言佛駄跋陀羅沒有到過廣陵郡郡治廣陵縣的謝司空寺。《江南通志》、《揚州畫舫錄》中關於「佛駄跋陀

羅」的記載，正從一個側面證明佛馱跋陀羅曾經來過當日廣陵郡治廣陵縣的謝司空寺，亦即在東晉義熙年間，佛馱跋陀羅曾在長江以北的廣陵地區有過活動。海陵是當日廣陵東部的唯一城市，兩地相距不過百里，且又平原地區水陸相接，因此佛馱跋陀羅在廣陵活動期間順道遊方海陵之時建寺可能存在。

其三，從當時的特定歷史背景來看，佛馱跋陀羅義熙年間在海陵建寺與當日時代風尚相合。東晉王朝「偏安江左，帝主妃後皆溺情釋典」，（唐）法琳《辯正論》說東晉一〇四年間，建寺一七六八所，其中首都建康最多，諸如東晉元帝建瓦官寺、龍宮寺，明帝造皇興寺、道場寺，成帝建中興寺、鹿野寺，康帝褚皇后建延興寺，穆帝何皇后建何皇后寺，孝武帝建皇泰寺、本起寺，安帝建法王寺，簡文帝建波提寺，敬王司馬純之建彭城寺，會稽王司馬道子立建治城寺；征西將軍謝尚捨宅建莊嚴寺，中書令王坦之建臨秦寺、安樂寺，征北將軍蔡謨立棲禪寺，車騎將軍王邵建枳園寺，中書令何充建興福寺等等，不一例舉。東晉以來，「修營佛寺，務在壯麗」<sup>7</sup>，建造佛寺成為當日帝后王侯時尚，所謂「舊宇頽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誇尚」<sup>8</sup>，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餘波及至建康附近江北地區，在當時

的特殊歷史背景下，佛馱跋陀羅在海陵縣創建佛教精舍只是東晉義熙年間建造佛寺時尚的一個縮影，符合當日社會佛教傳播歷史邏輯。

其四，「覺禪」是「佛馱跋陀羅」漢譯異文，「覺賢」與《崇禎泰州志》所說「覺禪」兩者泰州方言讀音相合。「佛馱跋陀羅」是梵文buddha-bhadrā的音譯亦音譯作「佛陀跋陀」，漢譯「覺賢」或「佛賢」。南朝（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佛馱跋陀，齊言佛賢，北天竺人也。」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唐）釋道宣《大唐內典錄》卷第三：「右一十五部。合一百一十五卷。安帝世，北天竺國三藏禪師佛陀跋陀羅，晉言「覺賢」，於揚都及廬山二處譯。」（元）普度《廬山蓮宗寶鑒》卷四：「廬山十八大賢名氏……佛陀跋陀羅尊者，此云「覺賢」，甘露飯王之裔……。」

如上所引，無論「此云」也好，還是「齊言」、「晉言」也好，總之，在南朝以來的佛教典籍中「佛馱跋陀羅」漢譯中作「覺賢」。

今考南朝佛學典籍以及《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未見東晉、劉宋有名為「覺禪」僧人。而恰恰能與《崇禎泰州志》所說「覺禪」讀音相合的就只有前代佛學著

作所說「覺賢」。

「覺賢」之「賢」，普通話讀xián。賢，古韻屬山攝先韻、開口、平聲字。今泰州方言亦讀xián。《崇禎泰州志》的「覺禪」之「禪」，普通話讀chán，又讀shàn。禪，古韻屬山攝仙韻、開口、平聲字。古代兩字讀音相近，今泰州方言讀xián，「賢」、「禪」在泰州方言中的讀音完全一樣。「禪」字從示單音，「單」作姓時，普通話讀shàn，《康熙字典·口部》：「單，《廣韻》《韻會》常演切《集韻》《正韻》上演切，並音善。」善，普通話讀shàn，泰州方言讀同xián音。今泰州方言「單」作姓時，讀同「先(xiān)」、「仙(xiān)」，今泰州有單聲珍藏文物館，單聲先生是著名愛國僑領，今泰州城區四十歲以上的人均讀「單聲」之「單」為xián，也可證明泰州方言「禪」、「賢」同音。

《崇禎泰州志》的作者劉萬春是泰州本地人，「覺賢」和「覺禪」的讀音是相同的，這就可以解釋劉萬春為何要將「覺賢」寫作「覺禪」。筆者臆測不外兩種情況，一是劉氏不熟悉佛教的掌故，因「禪」「賢」同音而寫錯，是通假字；二是劉氏熟悉佛教的掌故，認為佛馱跋陀羅是禪僧，感到前人翻譯不準確，而以意譯「覺禪」更妥。筆者更傾向於後者。「覺禪」只是「佛馱跋陀羅」漢譯的異文而已。

（未完待續）

## 註釋：

\*葛崇烈，男。一九五二年生於江蘇泰州。一九八三年蘇州大學中文系畢業，一九九一年獲社會科學系列副研究員職稱。現為江蘇泰州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泰州佛教志》特聘編委。

1. 《輿地紀勝》卷四十（泰州）。
2. 「陀」，古用同「陀」。
3. 《揚州畫舫錄》原作「謝司空琬」。謹案：謝氏無「謝琬」，當是《揚州畫舫錄》校誤。
4. 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
5. 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
6. 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
7. 見《晉書·王恭列傳》。
8. 《晉書·天竺迦毗黎國列傳》：「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宇頽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誇尚。」謹案：劉宋元嘉十二年（四三五），距東晉義熙十四年（四一八）僅距十七年，蕭摹之所說，正是當時義熙年間真實情況寫照。